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Lushanwenhuayanjiu Congshu

走进庐山，遍揽云飘雾绕，秀峰绝壁的山川画卷；探寻庐山，透视高僧大德，鸿儒巨匠中的文化命脉；
品味庐山，尽享包蕴天地、领悟真髓的精神甘霖……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

TAOYUANMING YU DAOJIAWENHUA

吴国富/著

2008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

吴国富/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吴国富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8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甘筱青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4235 - 8

I. 陶… II. 吴… III. 陶渊明(365 ~ 427) - 人物研究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554 号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

吴国富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370 千 印数:1—20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4235 - 8 定价:2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吴国富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8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甘筱青主编)

ISBN 978-7-210-04235-8

I. 陶… II. 吴… III. 陶渊明(365~427)—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2554 号

陶渊明与道家文化

吴国富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370 千 印数:1—2000 册

ISBN 978-7-210-04235-8

定价:2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甘筱青

副主编

欧阳春

编委会成员

李宁宁 吴国富 计 斌 李华锋
张晓明 龚晓天 王凯明 王贤森

跃上葱茏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总 / 序

九江学院院长
甘筱青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壮丽诗篇,使人们心潮澎湃,给庐山增色添辉。

钟灵毓秀的赣北大地,东襟浩渺鄱湖,北枕滔滔长江。在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江河湖水之间,矗立着千古名山——庐山。这里自古是从楚到吴的咽喉之地,也是从中原到南粤的必经之路,雄镇着中国的东南半壁。自古至今,这里南北交织、七省通衢,商贾汇聚、人文荟萃。在中国历史上,这里“三大茶市有其名,四大米市有其位”。千百年来,秀美的自然山川,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并催生了灿烂的庐山文化。1996年,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入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

作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瑰宝,庐山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世界所瞩目。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周瑜在宫亭湖驻军,慧远在东林建寺,陶渊明在柴桑归隐,庐山就迎来了她第一个文化创造的高峰。而从三国到近现代,有无数文化巨匠、政治贤达、民族精英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踪迹。现代学者胡适1928年游历庐山,曾对庐山文化的内涵和影响作了高度

概括：“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当然，这三大趋势远远不是庐山文化的全部。以宗教而论，庐山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于一山；以教育论，与白鹿洞书院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理学宗师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以山水田园诗而论，有以谢灵运为开端、积累一千多年的山水田园文学宝库；以政治文化而论，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与领袖人物，都与庐山有着深切的关联；以军事文化而论，一代名将周瑜、岳飞都曾经在这里鏖战，朱元璋鄱湖大战的传奇至今广为流传；此外还有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中国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陈门四杰”等等。这一个个彪炳青史的人物，这一桩桩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事件，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版图中，毫无疑问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而中国众多的名山大川和文化名胜中，庐山文化始终以其特有的那份清新隽永和恢宏旷达的神韵与气象，令历代文人学士向往。

秀美的山川自然、敦厚的庐山人文，造就了这方天地的今古传奇，滋养了这方天地的教育沃土。

2002年，在原解放军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九江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九江学院。作为扎根于庐山脚下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本科院校，九江学院自然应承担起传承和发扬千年书院文明的使命，承担起研究和弘扬文化的重任。事实上，使优秀的庐山文化发扬光大，既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需要，同时也是九江学院提升办学品位、形成文化品牌的自觉要求。

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根本途径，一所高校是否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不仅关系到一所高校能否形成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特色，而且关系到一所高校能否真正解决

育人的质量等核心问题。而培育高校的人文精神,既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引领,也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对历史精神的发扬。作为一所地方性的本科院校,尤其要重视从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养料,并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掘和研究,形成自己的办学和教育、研究的特色。

九江学院一贯注重本土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其中陶渊明研究、周敦颐研究、黄庭坚等,都已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自20世纪80年代创立以来,坚持了二十余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全国“研陶”中心;同时,依托这个基础,推出了一批“研陶”专家。近两年学校提出“围绕独特资源山江湖,引领学科建设大发展”的办学理念,对庐山文化的研究给予重点支持和投入。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方面通过聚合学校的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围绕庐山及赣北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课题展开广泛的专题研究活动;另一方面,积极与各级地方组织联合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诸如与德安、星子、九江县合作,举办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合作,举办传统国学讲习,开展书院文化的研究;与湖口县合作,保护和传承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湖口青阳腔”;与瑞昌市合作,保护和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瑞昌剪纸”;与郑州大学联合举办两校师生组团互访的“书院文化之旅”等等,这些活动在省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2008年4月,教育部专家组在对九江学院进行本科教学水平的评估中,高度评价了九江学院的办学特色,其中之一是积极弘扬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文化,不断厚实大学人文精神。

以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撰出版的《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已于2007年12月出版,由于丛书严谨的选题和风格,鲜明的学术品位和质量,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庐山文化研究丛书》坚持以挖掘庐山及赣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中心内容,致力于九江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涉及范围基本涵盖庐山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其中以八个研究专题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1.九江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事件的系列研究。包括三国、东晋、南朝在江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南宋岳飞在九江的活动、太平天国在九江的历史、民国政治与庐山、毛泽东与庐山等内容的研究;以及九江的米市、近代的开埠、九江与鄱阳湖黄金通道的关系等研究;

2.庐山的宗教文化研究。包括东林寺净土宗佛教、云居山佛教、庐山简寂观及太平宫道教、近代庐山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研究;

3.庐山的教育文化系列研究,包括周敦颐的濂溪书院、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宋代书院与宋明理学等的研究;

4.庐山的山水旅游文化研究。包括以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等为代表,以历史上众多文人名士游览庐山的佳篇为主要内容的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

5.陶渊明诗文、思想、生平、文化影响研究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文化的研究;

6.地方文化名人及其典籍的系列研究。如黄庭坚、陈寅恪等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

7.建筑文化的系列研究。如庐山近代别墅的研究,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俗研究;

8.九江地区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如湖口青阳腔、瑞昌剪纸艺术、武宁打鼓歌等民间艺术的研究。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开放的研究平台和精诚合作的研究机制,吸纳国内外精英人士参与庐山文化研究,并支持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努力打造具有较多学术创见和研究特色的学术精品。每一部收入《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著作,应具有专题明确、资料丰富、挖掘深入的学术品格,同时要具有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特点。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计划每年出4—5部学术专著,围绕庐山文化研究的相关专题,形成庐山文化研究的研究系列。已经出版了《庐

山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包括《慧远法师传》《湖口青阳腔》《陶渊明寻阳觅踪》《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庐山新说》《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五部专著。《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包括《庐山文化大观》《庐山文化读本》《瑞昌剪纸》《陶渊明与道家文化》《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五部专著。

对于蓄势腾飞的九江学院来说,《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作为庐山文化研究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它将成为九江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凸显亮点,成为高校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实践;同时也为打造九江学院的人文精神奠定厚重的人文基础。本丛书应具有丰富的内容、开阔的视野、高远的目标,既显示庐山文化的大气,也显示九江学院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对《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高度关注和厚爱,同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衷心期待: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光彩。我们共同期望:庐山文化的研究事业,能够如群峰竞秀,跃上葱茏,屹立于长江之滨、鄱湖之畔。

引言

隐逸之真与真的回归

在以往的一个世纪中,这样的议论我们听得太多了:隐逸是精神的麻醉剂,它绝对是消极的,让人堕落的;我们所持的人生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奋进的、充满斗争性的。持此论者,面对古代的隐逸者时,就会产生一种惯性思维:你不是提倡隐逸吗?那么你就来个彻底的、不折不扣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吧!否则,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假隐士,与其带着虚伪的面具去隐逸,还不如剥下你的伪装,暴露你贪婪的、伪善的、世俗的本来面目!在这种议论的压迫之下,偶尔有人歌颂隐士,也总要将他描述成超然脱俗、难以企及的形象,否则就无法应对别人对隐士的指斥。

“隐逸消极论”在当今也还有不少市场。例如在陶渊明的故乡,就有人大声叫嚷:“我们的经济不够发达,都跟陶渊明这种消极退隐的观念有关!在他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贪图安逸,不思进取!”这些貌似鲜活的思想,其实并不鲜活,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说过。例如三国时魏国麋元在《讥许由》中说,太上贵德,其次立功,如果许由你认为尧帝时为圣明之世,就应当伸展不羁之志,建立不朽之功;如果认为尧帝时是昏暗时世,你就应当拨烦理乱,拯济生民。现在

你却只知道隐居,说你聪明,则不仕圣君;说你高洁,则与鸟兽同群;无功可纪,无事可论,岂非白白到人间走了一遭?麋元又作《吊夷齐》讥笑隐居西山的伯夷、叔齐,说他们隐逸得不够彻底:“首阳谁山?而子匿之。彼薇谁菜?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读周之书,弹周之琴,饮周之水,食周之芩,而谤周之主,谓周之淫。”真乃是“居圣之世,而异圣之心”。伯夷、叔齐说周朝不道德,发誓不食周粟,可他们隐居的是谁家的山?周天子的山!他们吃的是谁家的野菜?周天子的野菜!他们喝的是谁家的水?周天子的水!占着人家的山,吃着人家的野菜,居然还要骂人,也太不知廉耻了吧?相比现代的“隐逸消极论”,两者是何等的相似!抱有这种绝对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意,便是对隐逸理解不够。

然而隐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不妨用一种推理的方式来说明。隐逸是一种起源很早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我们只要把不属于它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层层剥离出去,其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第一,随波逐流,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乱世,显然不为隐士所取

在人们自相残杀的乱世中,卷入漩涡的中心,绝不是隐士所取的生活态度。《周易》说:“天地闭,贤人隐。”《庄子》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嵇康《高士传》记载:伯成子高在唐虞之时为诸侯,至大禹时,弃官躬耕。大禹觉得不理解,伯成子高说:“昔尧治天下,至公无私,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这就是他弃官躬耕的原因。当然,大禹之时,世道只是开始衰败,还不算纷乱,到后来更加纷乱的世道中,许多人就只能以隐居求全了。梁朝沈约《七贤论》说司马氏执掌朝政,铲除异己,为篡国开道,当时名士难以保全,所以阮籍、嵇康也只能借“毁行废礼,以秽其德”自保,但嵇康最终还是难免一死。

在乱世中卷入争斗厮杀,很可能遭遇灾祸。袁淑《真隐传》记载战国时苏秦、张仪拜鬼谷先生为师,后来游说列国,遂立功名,鬼谷先生写信劝告他们说:“若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波浪荡其根,上无径尺之阴,身被数千之痕,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华霍之檀桐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根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受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哉?盖所居然也。”这种劝告,绝非故意耸人听闻。

在动荡的、纷乱的、充满血腥味的社会生活中,只有具备野蛮而强大的力量,才能在肉搏中保全自己;否则只有被戕害,白白丧失生命。在这种环境中,虽然不排除有人以正义为宗旨,扫清各种作乱势力,为天下争取太平,但总体上看还是争权夺利、互相残害的人占多数。在这种环境中选择了隐逸,也就选择了安宁的生活,更选择了正常的人性。

第二,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参与倾轧,同样不属于隐逸

充满战争与残杀的世道,固然与隐逸对立,而在所谓的“治世”,也有可能出现与隐逸对立的环境。政治具有支配他人及社会财富的力量,也很容易变成为升官发财而倾轧争夺的社会土壤。在这种情况下,从政者歪曲运用了文明的成果,将人的动物性演绎为凶残的社会属性,将政治变成可怕的绞肉机,如梁沈约《高士赞》曰:“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东汉张衡所处的政治环境就是如此:“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在历经折磨之后,张衡作《归田赋》云:“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深深感受到“苟纵心于域外,焉知荣辱之所

拘”的可贵。充满风险的官场,使人感受到隐逸的美好。

充满倾轧的官场,使置身其中者如临深渊,吉凶难测。退出官场,归于隐逸之后,欢乐平安自然存在于身边,就无需关心吉凶祸福了。晋张华《归田赋》曰:“瞻高鸟之陵风,临儵鱼于清濑……以退足于一壑,故处否而忘泰。”晋孙承《嘉遁赋》曰:“游无方之内,居无形之域。咏休遁之贞亨,察天心而观复。委性命于玄芒,任吉凶而靡录。”

在这种情况下弘扬隐逸,实质上就是弘扬人性。充满倾轧的官场,等于给人类从蒙昧时代带来的野蛮本性装备了全套武器,诸如权术、阴谋、刀兵等,致使人类的残忍比动物超出千万倍,正常的人性之光因此湮没不见,文明的成果遭到严重的摧残。在君臣大肆倾轧的时候,保持理智的人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尽量减少邪恶之火的燃料,尽量不介入浑浊的官场,使之变本加厉,乃是值得歌颂的行为。若能做到以暴制暴,在残暴熄灭之际转向于对隐逸的认同,也同样值得歌颂,但如果以暴制暴后掀起新一轮的残杀,就是贪婪而变质的政治家了,自己亦将面临生命的危险。因此,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中不卷入倾轧的隐士,就弘扬了正常的人性,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古代君王尊崇隐士,其用意在于让人们认清政治的本质,教育从政者遏制邪恶势力的发展,减轻政治的压力和负面影响;而当政治处于不正常状态时,隐逸的流行也可以减少不良政治的支持者,催生不良政治的反对者。魏曹植《许由巢父池主赞》曰:“尧禅许由,巢父是耻。秽其溷听,临河洗耳。池主是让,以水为浊。嗟此三士,清足厉俗。”梁沈约《为武帝搜访隐逸诏》曰:“若有道映丘园,事乎高尚,可以弭竞迁浇,还风拯俗,皆以名闻,靡或遗漏。”梁沈约《为武帝与何胤敕》曰:“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

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轨物，则泊流所至，莫知其限。”毋庸置疑，隐逸文化的流行在中国古代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提倡隐逸，可以让人进退得宜，进则做该做的事，有益于国民，如晋夏侯湛《鲁仲连赞》曰：“流仁忧乱，抗道自絜，随事抑扬，与时开闭。”退则过恬淡幸福的生活，处于生活的常态，如晋夏侯湛《范蠡赞》曰：“进报危国，退弘妙理。身与勋偕，名与身否。逸群远游，永齐终始。”诚然，如范蠡、鲁仲连等人，他们的才华谁不景仰？他们的功业谁不赞叹？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才华和功业，忘记从政的根本宗旨，忘却人性的本来面目。

第三，在良好的、正常的政治环境中，隐逸也具有独立的意义，但不会与政治形成尖锐的对立。政治既不一定需要隐逸者参与，隐逸者也不一定需要从事政治，人们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隐逸，仕隐是自由的

嵇康《高士传》记载，齐宣王猎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赐父老不租，闾丘先生独不谢，曰：“愿得寿、得富、得贵。夫选良吏，平法度，则臣得寿矣；振之以时，则臣得富矣；令少敬长，则臣得贵矣。”又记载郑仲虞不仕汉朝，章帝亲自去征召，终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为上世君，令臣得为偃息之民。”汉章帝遂以尚书禄终其身，世号白衣尚书。如果齐宣王、汉章帝没有忘记君王的根本职责，闾丘先生、郑仲虞所选择的隐逸生活与政治就是不矛盾的。君王的职责就是为了普通的百姓过上和乐安定的生活，假如闾丘先生、郑仲虞已经在过和乐安定的生活，君王就不必多此一举，强迫他们出仕了。

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清除害群之马，保持天下的和平安宁，这又与隐逸生活一致。嵇康《高士传》说，黄帝去具茨之山见大隗，却只看到了小童，黄帝请问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亦奚异牧马哉，

去其害马而已。”隐逸乃是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是正常人性的体现，政治的目的就是保护正常的生活和人性，去掉破坏性的害马。嵇康《高士传》记载，壤父之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当人们感觉不到对政治的需要时，政治便处于良好的状态，良好的政治与隐逸是统一而不是对立的。

晋石崇《许巢论》曰：“盖闻圣人在位，则群材必举，官才任能，轻重允宜，大任已备……则宜敦廉让以励俗，崇无为以化世，然后动静之教备，隐显之功著。”具体说来，政治的职责是保障社会的安定，妥当地选用人才，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前提下，众生各安其业，也就等于在各种行业中隐居。人们可以如东方朔一般，把朝廷金马门当做隐栖之地；也可以“大隐隐于市”；也可以如陶朱公一般，在经商中隐逸；更不妨自耕自种，隐于山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时的隐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只是一种普通生活，一种平常的心态。因此，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中，隐逸不是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精神。当天下安定的时候，隐逸是无所不在的，聪明的政治家绝不会认为隐逸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将隐逸者硬生生地拖入政治的竞争之中；那样对民生、对政治皆没有任何好处。

第四，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情况下，隐逸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活方式。政治有它自己的特点，它的规定性、约束性和事务性，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应。社会上存在各种职业，从政是其中的一种；芸芸众生有适合不同职业的个性特点，不必全部纳入从政的轨道

规范性与一致性决定政治的效力，循规蹈矩是从政者必备的素质，生来不喜欢受约束的人如果从政，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个性。完全改变自己的个性是痛苦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为官而选择自由自

在的隐逸。正如庄周所云：“今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宁生而掉尾涂中耳！”战国时，高士鲁仲连以利害说服魏国与赵国联合抗秦，解救赵国；又协助齐国田单收复聊城，田单想给他封爵，他却说：“吾与于富贵而诟于人，宁贫贱轻世而肆意。”鲁仲连不出仕，也有个性不合的因素在内。

古代很多人意识到自己不适合从政，如果硬要去从政，轻则丧失人生的幸福感，重则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晋张载《招隐诗》曰：“山林有悔吝，人间实多累……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晋间丘冲《招隐诗》曰：“大道旷且夷，蹊路安足寻。经世有险易，隐显自存心。”梁刘孝标《始居山营室诗》曰：“自昔厌喧嚣，执志好栖息。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总结起来，事务多，劳心多，艰难险阻多，喧嚣多，历来就是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适应这些特点的个性，从政就会丧失人生的幸福，还不如处身隐逸，为乐更多。晋陆云《逸民赋》曰：“富贵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轻天下，细万物，而欲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岂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贵于芬华哉？”梁昭明太子萧统《与何胤书》曰：“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玩泉石，激扬硕学，诱接后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乐可言乎，乐可言乎？”这些都是真实的感受，非徒以隐为高而已。

第五，隐逸之真与陶渊明的回归于真

古人将隐逸的本质总结为一个“真”字。魏阮瑀诗曰：“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晋张华《招隐诗》曰：“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张协诗曰：“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

真是什么？晋戴逵《闲游赞》曰：“降及黄绮，逮于台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黄绮即西汉初著名隐士商山四皓中的夏黄公、绮里季，台尚即东汉隐士台佟和向长。戴逵所说的“太和”、“天真”，乃是人类的淳朴之心，说白了就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闲